

胡寄窗文集

WEN JI

胡寄窗

HU JI CHUANG



中财 B0031846

胡 寄 窗 文 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8 号

胡 寄 窗 文 集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通县西定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33.375 印张 800 000 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 定价: 42.00 元

ISBN 7-5005-2075-1 / F · 1963

序 言

我一生的生活经历是很不平坦的，在 20 年前所填的一阕满庭芳词中，曾有“蹭蹬生涯、坎坷旧梦，回首也自心惊”数语，实为极确切的写照。然而，在论著的发表方面却系较为顺畅的。本世纪 20 年代初，我在北平燕京大学当预科学生时起，就陆续在国内有名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和其他性质的文章，至今回忆似乎还没有哪一篇著作最后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当然也有几个重要的例外，即有 3 部各数十万言的专著因某种特殊原因未获刊行。第一部是我在 1947 年将历年从事西洋经济学说史的讲义交由滕茂桐教授介绍交给正中书局出版，该书局预付了全部稿费并安排在次年付印。殊知到 1948 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正中也随蒋政权逃往台湾，不仅书未出版，连稿子也不知去向。假如此书当时能问世的话，在世界同类著作中也应是较为新颖的一部。因为其内容已为凯恩斯、垄断竞争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等辟有专章介绍。而现代仍流行的伊利克·罗尔的名著《经济学说史》在其 1947 年的修正版中尚未给凯恩斯另立专章，只在其“古典经济学的下一代”一章中作了概略的论述，更未涉及一般均衡理论等问题。第二部是 1951 年我把在之江大学时编成的计划经济讲义交给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也预付了全部稿费，但以该书局奉令改变专业方向，专事出版有关古代文献著作，因而此稿也未能刊行。第三部是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我由杭州调到上海财经学院后，即将计划经济原稿加以充实增补，以国民经济计划命名交给立信会计

出版社出版。当该书稿的清样已送给我校对了约七、八万字时，因书稿之出版将与教研组中另一位有力成员的利益发生矛盾，遂引起一场无谓的大风波，我才决定不再出版此书了。以上3部专著之未能问世，虽各有其特殊原因，但都表明在我的顺畅的著述生涯中，仍然是存在着波折的。即就我已刊行的十几部专著来说，有的也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拖延了三、五年乃至七、八年才与读者见面。《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稿于1965年年底即已交给出版社，终于因文化大革命关系以及文革后我需要参考此书稿之资料以撰写英文稿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以致拖延了16年之久才得以出版。至于已发表过的许多篇论文，在本书目录各论文的标题下所注明的年月，均系以论文在各报刊出版的年月为依据，事实上有的论文在发表前一年半载乃至一两年即已脱稿者，亦非罕见。因此，所谓著作发表的顺畅主要是就论著均获得发表机会而言。

正由于发表文章比较顺畅，也就养成了我的一种不良习惯，即写文章不留底稿，文章发表后也不关心有关报刊之保存。我不留底稿还另有原因。30年代后期我在成都任《平报》主笔，几乎每天都得登载一篇我写的社评。而写社评必须在每天夜里11点钟前后全部新闻稿编辑完竣才能决定写什么主题的社评。此时排字工人常是在编辑室等候，匆匆写完一页即交给他拿去排印，等到社评写完连全稿都无法重看一遍，何能保留底稿？又如40年代后期，不时写一些批评时势的论文送交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发表，文稿常是匆匆地在夜晚九、十点钟写成就派人送到报社，明晨即可刊出，也不可能再留底稿。至于已发表的文章也不加珍视保守，又另有其特殊原因。我在青年时代就自认为是“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说，走出去能办事”的全才。再加受古人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影响，把写文章“立言”

看成是第三等的事业，远不如“立德”、“立功”之有意义，直到 68 岁在井岗山麓自咏的几句感怀绝句中尚谓“岂望文章百世流、工农立德亦千秋”。除去这种传统思想影响之外，由于青壮年时代的笔头较快，短篇文论似乎倚马可待，即使是数十万言的专著，写成亦非难事，自会视著作成果为无足重轻。故在反右运动中有人有我在所在的办公室门旁贴大字报：“一部数十万言的著作未能出版，心中定有意见，为什么不向党交心”。贴大字报者哪里知道，在这部书稿之前我已有不止一部专著稿未能出版，如一一为专著稿之不能出版而焦心，如何得了。因此，我早年究竟刊行过多少篇文章，在何时何处发表，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尤其是以往文章所用笔名并不一致，现在更难清理。联系到笔名有一件趣事附带谈谈。青年时代我曾用“酸狼”为笔名。因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应为“三郎”，故用此二字之谐音作“酸狼”。狼已是很残忍之动物，酸心之狼会更加残忍。作为那个时代青年之我而以此为笔名，足见其思想之荒诞狂放。更有趣的是当时同意登载我文论的主编们均为文豪学者，他们也未以此为怪。不仅不珍视已刊行的文论之保存，一般人毕生难忘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之庆幸，我也等闲视之。甚至对大名家所赐的手札也不予珍藏，如我在大学本科时曾写就新诗一首给《创造》季刊投稿，郭沫若收到拙稿后即回信说决定在《创造》下期登载，不幸《创造》未出此期即突然停刊；又如 30 年代留学英国时曾对当时凯恩斯的追随者、现代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德的一篇论文持有不同意见，即致函凯恩斯，凯氏给回信之大意是：你们二人所谈的不是同一问题，不必相提并论。不论此两事件本身之结果如何，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和郭沫若的亲笔复函应是值得珍藏的，而我仍把它们视作一般信件，随即遗失。这一切均表示我青年时代不珍惜自己著作成果以及漠视世俗崇尚和风云人物的思想状态。从 70

年代之末起才开始改变习惯，将登载有我文论的报刊逐一保存下来。

大体说来，我历年刊行的论著的性质，以 1936 年赴英留学为转折点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所发表的论著的性质是相当复杂的，新旧诗词、短篇小说以及有关党、政、工商和学术之类的文章应有尽有。后一阶段基本上均为有关经济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之论著。从发表论著的时间连续性来看，除留英期间及以前两三年未撰写短篇论文而外，解放后的最初 30 年中也较少发表论文。这并不是由于受各种政治运动之影响，主要是从解放初起特别是 1955 年以后，我已将全部精力集中到各大部头著作之编写，抽不出较多时间来写短篇论文。从 1949—1953 年这几年中，曾忙于两部有关计划经济著作撰写。1955 年审干我是重点对象，被停止教学工作靠边站。但在“变坏事为好事”之启迪下，我充分利用此时机全力以赴地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之整理、研究和编写工作，经过 10 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全部完成此科研工作。文革期中的前 5 年在江西过“牛棚”生涯，无法从事任何论著的撰写。1972 年我的“牛棚”生活暂告结束，被容许退休回到上海，又私下从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之编著。这是 1966 年初中央高教部文科教材编写处通过江西大学下达给我的编写任务，要我按照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卷本的编写体系继续撰述其近代部分，旋因文革开始而未能执行此任务。文科教材编写处早已组成了一个以赵靖和易梦虹教授为主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材编写小组，且其成果已经出版，还要我按照自己的体系另编近代部分，这种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实令人万分感佩。我退休回沪后，所编写的初稿即为 1984 年刊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的一部分。文革末期，我又开始进行英文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编写。当时王维中教授曾善意地

提醒我说：“这种不以儒法斗争为线索的著作，将来能出版吗？且以英文编写会不会被人指责有“‘里通外国’之嫌”。我诙谐地回答说：“也许到我的英文稿写完时，‘儒法斗争’就不斗了”，不幸而言中。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中，虽然很少发表短期论文，而我从事专著撰述的工作除文革期中的前5年外迄未中断，并是在夜以继日、争分争秒的紧张状况下进行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英明政策，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从事科研工作的春天。我不仅出版了十几部学术专著，还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在我此生已刊行并有保存本可查的近500万言论著作中，有2/3以上的初稿均是在这10余年内新写成的。80年代以来不仅是我此生发表论著的最畅旺时期，其研究方向也起了一些变化。1984年我感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理研究任务已可基本上告一段落，于是又重理解放前西方经济学及其学说史的旧业，其目的是为了能结合中西经济学说进行理论对比分析，弘扬祖国古代的光辉遗产在世界范围内的贡献，并藉以丰富世界经济学说史的内容。1987年而后又进一步地从纯经济理论及其学说史之探讨，转而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写了许多篇有关现实经济问题的论文。因此，我自80年代以来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中，前期以中西经济思想之纯理论及其学说史的论题为主，此后则愈来愈多地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参考意见。

本书中所收集的论文，解放前部分，全采自我所创办和主编的《经济学报》和《经济论评》两刊物，但两刊物上登载我的不少篇翻译文章并未收集在本书之内。至于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很多文章，因既无底稿又未保存其刊登的报刊，只好割爱。就连我自己创办的两种经济刊物，手边也并未保存有原本，全赖不少同志分别在各地图书馆查出后代为复印寄来，才得重睹旧物。50年代所写的论文，只收集了“价值决定不是价值规律”和“汉代农

业经济循环论”两篇，也非我原有的藏本而是在其他地方偶然发现的。1979年以后的论文倒是采自我自己所保存的刊物，惟其中给别人著作所写的不少篇序言和书评以及为《大百科》撰写的条目，均未予收集。本书中也有极少数几篇论文是未发表过的，有的是向中央领导同志提供的建议，不便事先发表；有的是现实中很棘手的问题，各刊物主编很感兴趣但不愿刊出或不敢全文刊出；还有一篇题为“古代赋税思想之演变”，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竟未送去发表。

在本书已收集的论文中，40年代中前期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几篇论文，现在看来甚为粗俗简陋，但在当时经济学界却是颇为新颖的理论，近年来有不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对我说，他们正是在看过这些论文后才开始对经济理论之研究感兴趣。同时期的其他十几篇论文，对当时经济学界的一些理论观点提出疑意与分析，批评其错误的观点；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因受时代局限，上述论文自有其不甚妥当之处，现将它们原文重印出来，亦可反映我前半生之思想演变过程。至于新中国建立后所刊行的数十篇论文，大致可分为四类。首先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方面，对史学家们长期以来未弄清楚的井田制、农业经济循环论等问题以及人们不敢设想的中西经济思想之对比分析，均作出明确而系统的阐述，并对古代史分期、封建经济的缓慢演变和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在历史分析中作用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特观点。这些对研究中国经济史及思想史有兴趣的同志们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还有其参考价值。其二，在马克思经济学说方面，许多人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决定等问题上至今还存在着不正确的理解，我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剖析。其三，在西方经济理论方面，我除一贯坚持须吸收其合理部分为社会主义建设与理论服务外，对目前仍在国内外广泛流行的

IS / LM 分析进行了批判，并指出西方经济学正处在徘徊歧路的新观点，应是足资参考的。最后，对现实经济问题中的价值、工资、投资、股份制、经济增长速度等当前颇为棘手的问题以及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兼容商品经济的理论探索，我自 1987 年以来即已先后从理论上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新观点。这些至今还是热门问题自有其参考意义。此外，还有两篇与经济无直接联系的论文，因系讨论儒家文化的热门课题，故一并列入。现在党中央号召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人们开始解放思想，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态度与一年前相比已大异其趣，但理论认识尚欠深入。如理论认识还欠深入，仍可能再走弯路或错路。本书中收集的论文，除 40 年代所发表者已是历史陈述外，其余无论对学术研究或政策措施均或多或少的还有其现实的参考意义。这也是刊行此论文集的主旨，不全为给我自己的研究成果留一份历史纪念也。

为保持历史原貌，对文中译文、数字、个别提法及行文等，均未做统一的变动。

胡 寄 窗

1992 年 5 月

目 录

序言	(1)
一般性与专门性 (代发刊辞)	
(1941 年 1 月)	(1)
因德芬斯曲线之意义与应用 (1941 年 1 月)	(6)
克恩斯经济理论体系概述 (1941 年 1 月)	(22)
替代作用及其韧性之分析 (1941 年 1 月)	(33)
调整陕西战时物价工作纲领 (1941 年 1 月)	(43)
需求、需求曲线与需求韧性 (1941 年 2 月)	(47)
银行理论与中国银行机构之改造 (1941 年 2 月)	(65)
《中国战时物价变动》附记及其他 (1941 年 2 月)	(77)
报酬渐减法则 (1941 年 3 月)	(80)
限制法币外流政策之检讨 (1941 年 3 月)	(95)
费雪尔量数公式之研究 (1941 年 9 月)	(110)
租税问题附记 (1941 年 9 月)	(123)
经济建设之制度问题 (1942 年 1 月)	(126)
苏俄短期信用之功能及其性质 (1942 年 1 月)	(141)
充分就业论 (1942 年 4 月)	(160)
评银行管理办法并提供非常时期管理金融方案	
(1942 年 4 月)	(173)
《经济论评》创刊辞 (1946 年 10 月)	(186)
阿佛尔曲线之构成 (1946 年 10 月)	(189)

战后中国资本市场之暗礁 (1946 年 10 月)	(197)
贬值货币之购买能力与生殖能力 (1946 年 11 月)	(215)
从财富之流通状况去解释何以中国未早发生工业革命 (1946 年 11 月)	(224)
取消经济的敷衍政策 (1946 年 11 月)	(234)
二十世纪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946 年 12 月)	(238)
法币的将来怎么样? (1947 年 1 月)	(257)
挽救经济崩溃成立经济“内阁” (1947 年 2 月)	(272)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之分析 (1947 年 3 月)	(281)
把握解决物价问题之良好时机 (1947 年 4 月)	(290)
美金库券与公债之推销问题 (1947 年 4 月)	(298)
“价值决定”不是价值规律 (1959 年 7 月)	(301)
汉代的农业经济循环论 (1961 年 4 月)	(315)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古代史分期问题 (1979 年 6 月)	(332)
从世界范围考察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 成就 (1980 年 10 月)	(342)
我是怎样走上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道路的 (1981 年 2 月)	(409)
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思想 (1980 年 11 月)	(414)
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的探讨 (1981 年 5 月)	(431)
为实现祖国现代化而坚持学术研究 (1981 年 5 月) ...	(474)
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 (1981 年 1 月)	(480)
试论《管子·轻重篇》的成书年代问题 (1981 年 7 月)	(497)
《墨经》“为屨以买”条新诠 (1981 年 8 月)	(521)

《周礼》的经济思想 (1982 年 4 月)	(525)
“五四”运动到解放前夕我国经济思想发展总趋势	
(1982 年 5 月)	(630)
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历史分析中的运用	
(1982 年 7 月)	(673)
二十——四十年代中国的基本经济理论	
(1982 年 8 月)	(681)
古代赋税思想之演变 (1983 年)	(717)
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	
(1984 年 5 月)	(725)
希克斯—汉森 IS—LM 模式的批判 (1984 年 10 月) ..	(734)
论平准 (1985 年 1 月)	(756)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 (1986 年 3 月) ..	(773)
关于孔子思想的新评价 (1987 年 5 月)	(790)
社会主义与股份制 (1987 年 8 月)	(795)
对投资规模问题的理论剖析 (1989 年 12 月)	(805)
《管子》的财政思想 (1988 年 4 月)	(819)
股份制究竟是什么性质 (1988 年 5 月)	(852)
现行工资制度的症结——低工资制 (1988 年 6 月) ..	(859)
闯价格——工资难关的战略思考 (1988 年)	(875)
对价格、工资及一些有关问题的建议 (1988 年)	(893)
对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错误公式表述亟应改正	
(1988 年 9 月)	(905)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1989 年 1 月)	(915)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存在两种含义 (1990 年 3 月) ..	(923)
不可能存在两种异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兼答潘石同志 (1990 年 7 月)	(938)

对孙中山的中国现代化战略思想的再认识	
(1990 年 8 月)	(945)
经济周期理论探索 (1990 年 8 月)	(957)
追忆许涤新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	
(1990 年 9 月)	(971)
关于社会主义须兼容商品经济的理论分析	
(1992 年 4 月)	(975)
徘徊歧路的西方经济学 (1992 年 5 月)	(990)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及其有关问题	
(1992 年 2 月)	(1004)
附录	(1048)

一般性与专门性（代发刊辞）

文明之演进是由简单而趋于复杂，由笼统而趋于精密。此中之精意即经济学者所讲之分工。所以在社会之发展过程中，从某些观点看来，后一发展并不一定较前一发展更为有益。譬如杀人利器之高度发展，对于世界文化之威协力亦愈大，这显然不能算是有益的发展是很明白的。然而就发展的总体来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进步，否则我们只有倒退到太古时代的初民社会里去。

就学术界而言，这种发展所循的过程更为显明，一切的学术都是由一般性而趋于专门性，所以专门性就是进步，愈专门就是愈进步，对于社会之应用性之大小自是另一个问题。反过来说，如学术界一直停滞在一般性情况之下，那就不能不认为是不进步。

自然，所谓一般性也自有其时间之限制，这一时代之所谓一般性，也许即为前一时代之专门性。故不论其为一般性或专门性俱各有其时代之要求以为背景。然而时代的要求不一定常是正确的。比如同一时代中之同一学术，有许多地方已经趋于专门化了，而我们却仍然要求一般性，这就是不正确的要求，至少也是不进步之要求。

站在时代先头的人们应该是提出正确的、进步的要求的人们，不应当因为大多数的乡下人要求一个真命天子，我们给他们

一种帝制理论。同样的，不要因为社会需要一般性或者是 ABC 的理论，我们天天在甚么原论、甚么概论以及甚么浅说中打转身，这样是欺骗时代，使时代不进步。

亚里斯多德是博学多能的，他的时代需要他，即以经济思想而言，我们就不能不追述到这位哲学家。但是他的零碎经济思想现在看来算得什么，如以学他为满足，实在是大错特错。因此，不患有一般性之学术，而患只有一般性而忘却专门性之学术。

自严复介绍《原富》以来为时已数十年，关于经济学术之典籍可跻于专门性之林者共有几何？各大出版公司之经理常语人曰：社会不需要太专门性之读物。从牟利的观点看这是绝对不错的。这种思想还可怕的笼罩着现时代，若不加以破除，如何能迎头赶上。

在这种不正常的时代要求之下产生了不少的时代闻人，远之如梁任公，现存者为胡适之先生。《饮冰室全集》从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历史、文学、训诂、伦理、法律一直到作官、革命、为人，无所不通，结果是每一门学术都是那一门中的 ABC。胡适之先生本来是受过专门化教育的，应当知道专门性的好处。但因为五四运动而一日蜚声海内，成了一世的文人学者。而社会所认定的所谓文人学者，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出将入相、无所不能。胡先生为适应时代要求，恐怕人家说他天上的事情没有懂得一半，地下的事情没有全懂，所以努力热炒热卖，写一切问题的文章，作一切问题的讲演，念一切问题的书，作一切问题的学者，结果最有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半部。就胡先生本身而言是值得原谅的，因为这是社会要求他作一个无所不通的学者。然而就全社会的立场而言，这却是很不进步的现象。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非专门化不可的阶段，十年前可以适

用的情形，如今已有非其时也之感。很显明的，从前很好的军事领袖是由文人出身的儒将，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实例就是吴佩孚将军。我们可以断言，从现在起在一个高度机械化的军队里，绝对不会再有一位不从军事学校出身的秀才去作军师长，这就是专门化。军事如此，其他一切学术尤其如此。这才是现代中国的正确需要。

自然，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人感觉社会对专门性人才之需要并不如对一般性人才之需要来得广泛。人才也是商品，需要的多供给的也就多。上海滩上，“礼拜六派”的文人所著所类似于《老五殉情记》一类的小说，其销路远较《文学研究会》内的教授们的作品来得大。这种需要是不正确的需要，是人所共知的。所以我们不应当永远制造不合正确需要的商品，假如我们已经发现其不正确性的话。

在机械未高度发展的时代，土铁钉的用处是很大的。它可以用来挂帽子，钉破船板，补铁锅，甚而至于被谋害亲夫的女人用以去钉她丈夫的脑门。这是一般性的好处，同样一个铁钉子可以有很多的用途。但是现在是机械化的时代，土铁钉对于机械已失去其用途。现在需要的是螺丝钉，它除去对某一机械之某一部件有最大的用途而外，对其他方面就毫无用处，可是它对于某一机械之某一部件的效用是别的东西绝对不能代替的。

说到经济学，它的内容的发展比其他部门的社会科学大得多，比亚当·斯密时代的内容精深了若干倍。不但没有一个经济学者敢说他对于经济学范围内的知识无所不知，而且没有一个经济学者敢说他把经济学的典籍通通看过了。并且研究经济学需要相当的基本理论，虽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须按步就班的由浅入深去研究，有一定必经的步骤，但是经济学也有许多基本知识是研究经济的人们必须预先知道的，绝不是任何一个人便可侈谈经济问题。也正如一个没有受过高级军事训练的人绝不会使用最新式